

徐杰舜 主编 第一卷

汉族 风俗史

(导论·先秦汉族风俗)

徐杰舜 著



学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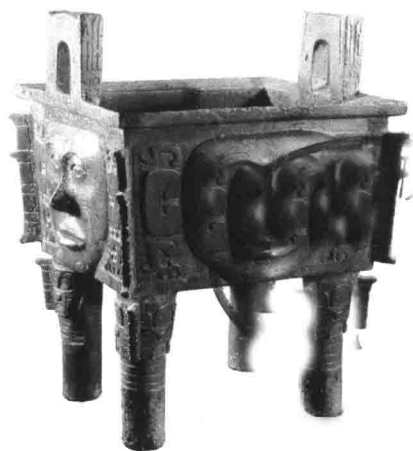
K892.311
X 736
:1

徐杰舜 主编 第一卷

汉族 风俗史

(导论·先秦汉族风俗)

徐杰舜 著



学林出版社

序

钟敬文

第
一
卷

汉族
风俗
史

001

序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组成一个大家庭,其中汉族是最大的一个。她分布的地域最广,人口最多,历史也最悠久。汉民族的文化不仅自身累积发展,她还不断吸纳各个少数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形成自己具有个性和特殊表现形态的文化体系。这种数千年来一以贯之地发展的现象,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是罕见的。她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式样,值得我们终身投入,全力以赴地去研究。这当中,下里巴人的文化样式,即民俗文化或民间文化,尤其值得我们去学习去研究。

我是历来倡导研究民间文化的。典籍文化固然代表了中华民族中的精英思想,但有些内容,它不仅原来就来自于民间,而且,即使统治者长期以来不遗余力地去推行,也没有在老百姓中扎下根去。比如,礼制说丧葬礼中不能用乐,老百姓在出殡时,偏偏办得热热闹闹,称它为白喜事。服丧时要以礼居丧,但老百姓却饮酒食肉,甚至乘丧嫁娶,名曰冲喜。这种事例非常地多,说明上层文化与下层的民间文化,是有很大差异的。如果我们不研究民间文化,我们就无法了解老百姓的生活,当然也就无法理解我们整个中华文化。从这个角度去看,研究民间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我国的民间文化由于吸纳了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内容而显得多层次,多色彩。其中,风俗文化是值得文化工作者,尤其是民间文化工作者去研究的内容。这些年来,我们从

整体上看,在风俗文化的研究方面,确实做了不少的工作,也出版了不少著作,出了许多成果。但是,离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大家庭所应该达到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我们在进行各个民族的风俗文化研究时,常常只注意少数民族风俗文化的研究,却忽略了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也是最悠久的中国主体民族——汉族的风俗文化的研究。这是很不应该的。要在今后的研究加以弥补,以适应作为主体民族所应有的地位。

当然,我们也做了不少地区性的汉族风俗文化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但整体性和系统性都不够,现在是对汉民族风俗文化进行整体的、科学的、有机的研究的时候了。这种研究,不仅能够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我们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底蕴,以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也能够为我们破除旧的不良的文化内容,为精神文明建设,为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服务。其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十多年以前,浙江民间文艺家协会的王恬同志跟我说,浙江的几个中青年民俗学者正在对汉民族风俗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准备撰写一部汉族风俗史,我佩服他们的勇气,并预祝他们的成功。为此,当时就为他们题写了“汉族风俗史”这一书名。十多年来,我一直盼着这部著作早日问世。如今,由徐杰舜任主编,周耀明、万建中、陈华文、陈顺宣等撰写的这部洋洋二百余万字的巨著终于要面世了,这是值得中国学术界,尤其是民俗学界庆贺的喜事!

这部著作,上至中华民族的源头,下到民国时期,历时之长,足以包容我们汉民族风俗源起、发展的整个过程。它以历史为经,风俗事象为纬,比较详尽地描述了汉民族风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变化,并努力去揭示汉族风俗的特点和演变规律,材料翔实,观点明确,难能可贵。它不仅是有志于学习、研究汉族风俗的人的好教材,而且对所有爱好中国文化的人来说,是帮助他们进一步了解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好助手。

在这里,我想借此机会对风俗史的研究多说几句话。多年来,

我国民俗学界比较注重风俗志的研究,在这方面的成果也特别多,这当然是一个好现象,完全值得肯定。但对风俗史的研究却甚为薄弱。多年来我就希望有一部有分量、有水平的风俗史问世,所以十多年前听说徐杰舜、周耀明、万建中、陈华文等人要写汉族风俗史,我就很高兴地为他们题写了书名。这次看了他们的五卷本的《汉族风俗史》清样,心中十分欣慰,尤其是他们提出在风俗史的研究中要注意风俗的民族性,我十分赞成。因为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一部中国风俗史,如果光讲汉族的风俗史,而没有少数民族的风俗,那只能是汉族风俗史,而不是中国风俗史。而要写中国风俗史,一定要包括少数民族的风俗史在内,此其一。

其二,我也十分赞成他们提出的在风俗史的研究中要注意风俗的历史性的观点。众所周知,所谓“史”就是事物起源、形成、发展和变迁的过程。在风俗史的研究中,只有从动态上注意掌握风俗事象较早出现的时间和状态,注意掌握风俗事象变迁的阶段和状态,注意掌握风俗事象兴盛而流行的时代和状态,才会有历史感。对民俗事象生存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密切关注,把民俗事象置于更为广泛的生存情境中加以考察,是这部风俗更值得特别称道的地方。这大大拓宽了审视汉族风俗史的空间。

《汉族风俗史》的作者们在民族性和历史性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为我们今后研究中国风俗史作了很好的示范。

当然,汉族风俗研究就如汉民族研究一样,在我国属于起始阶段。《汉族风俗史》作为第一部系统地描述和研究我国汉族风俗的专著,它也难免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比如风俗发展的分期问题、特点问题、风俗的分类问题,以及所引用的历史材料的真伪、可靠性问题等,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但不管怎样,作为初始研究的《汉族风俗史》,仍不失为一部具有独创性和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我愿意将它推给大家。谨以为序。

2001年2月6日

自序

徐杰舜

第一卷

汉族风俗史

001

自序

新世纪之初的金秋时节,随着《汉族风俗史》的杀青,我们为之奋斗了20余年的汉民族研究的学术体系终于形成了。回忆着20余年来自己孜孜不倦的执著的学术追求,心潮逐浪高……

一、播种

1985年4月22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用5号正楷排出的——篇“豆腐块”,题目叫做《汉民族研究刍议》。这就是我第一次在媒体呼吁加强对汉民族的研究,全文如下:

汉民族拥有近十亿人口,又有上下几千年的历史。但是,我国学术界对于这个世界上最大民族的研究现状,说来令人难以相信:全国数以百计的各种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唯独没有专门研究汉民族的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研究世界民族的任务,也有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的任务,唯独没有研究汉民族的任务;研究少数民族的专门刊物虽然不多,但是总算还有几家,唯独没有专门研究汉民族的刊物。这种情况,与汉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极不相称的。

有一些同志认为搞汉民族研究没有学术价值,因而不愿去从事这项工作。事实上,汉民族的研究是大有可为

的。例如，汉民族自西汉形成以后，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历经内忧外患，不管是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南北朝的分裂，还是辽、西夏、金的割据，元和清的统治，汉民族都没有被同化或被分裂，反而从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特别是其同化力和凝聚力形成的规律和表现，不仅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台湾的回归、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也是有现实意义的。又如，汉民族乡土观念的形成与共同地域的关系，汉民族复杂的方言与共同语言的关系，汉民族“以农为本”的传统与共同经济生活的关系，汉民族丰富多彩的风俗习惯与共同心理素质的关系等等，都是内容极其丰富的研究课题。总之，对汉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和特征等问题进行具体、深入、系统的研究，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又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文章虽短，但却很快引起学界同仁的注意，中央民族大学著名的民族史学者陈连开教授后来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碰见我，谈起我的这一篇文章时说：“当时看《光明日报》见到这篇文章，心想，这篇文章提的问题很重要，但这个徐杰舜不知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

我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说起来话长。1961年我从武汉大学附中毕业后，参加高考，阴差阳错地考入了中央民族学院分院（现为中南民族学院）历史系。当时我年仅17岁，年纪虽轻，经历虽单纯，却充满了追求理想的热情。进入了中南民族学院历史系学习时，一下子被历史吸引住了！

为什么我一下子会被历史吸引住了呢？这是因为我一上课就碰上了岑家梧教授给我们讲授中国原始社会史。岑教授当时是我国著名的人类学民族学家，其在日本求学时就以《图腾艺术史》、《史前艺术史》、《史前史概论》三本著作确立了自己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的学术地位，故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界中有“南岑北费”之

说,即中国南方的人类学民族学以岑家梧为学术带头人,北方以费孝通为学术带头人。岑教授深入浅出,把我在中学里认为最枯燥无味的原始社会,讲得生动且引人入胜,使我一下子就确立了决心终身献身于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的理想。

就是在岑教授的鼓励和指导,刚学完原始社会史的我就与已在大二就读的同窗彭英明(现为中南民族学院教授)一起,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积极投身到1961年起已在学术界争论得不可开交的关于民族译名问题的学术讨论中去了。当时牙含章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翻译情况》的论文,文中明确提出关于民族的形成问题,恩格斯早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是“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在这里牙先生只有论点,没有论证从部落到民族的历史过程。于是我们“现买现卖”,很认真地精读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撰写发表了我们的处女作:《试论从部落发展到民族的历史过程》。就是在这篇处女作中,我们在论证从部落发展成民族的历史过程的同时,提出了汉民族也是从部落发展而形成的观点,从而种下了进行汉民族研究的种子。

1965年毕业后即被分配到浙江武义县第一中学当起了中学教师,一干就是20年。理想如同植物的种子一样,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总会萌芽的!正如一首名为《播种》的小诗所言:

开始了
当我降落沃土
仿若看见
新旅程
远方的梦
伴随一声春雷

二、萌 芽

平地一声惊雷,1976年10月乾坤扭转,严冬过后,中国学术界迎来了温暖的春天,汉民族研究的种子,在春风的吹拂下终于破土而出,萌芽了!

我开始了汉民族形成问题的研究。

我觉得汉民族形成历史过程的问题仍然是一个前沿性的课题,于是汉民族研究的种子就从这里开始萌芽,正如一首名为《萌芽》的小诗所言:

我触碰
天的蓝
风的轻柔
朝阳的温暖
于是急切伸展

三、抽 枝

万事开头难。汉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作为学术界的一个前沿性课题,要去完成谈何容易?!

开始是没有时间,现在想起来真是艰难,白天要劳动,武义一中的农场不仅有一个200多亩的茶叶山,还有几十亩稻田,我一个人既要种稻,又要育茶,还要安排和带领学生劳动,而且学校农场离县城还有十几里路,每天奔来奔去,辛苦不用说,就是最宝贵的时间大大不够。于是我每天晚上挑灯夜战。记得1979年的冬天特别阴冷,且多雪,我常常用毯子把下身包起来,每天写到凌晨时分。在开笔撰写《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研究》时,我又到武义县桐琴果园去劳动。

在果园,我白天与农工一起劳动,下午收工后用井水洗了澡,吃了饭后就“躲进小楼成一统”(好在果园领导关心我,给我一个人住一间房)奋笔疾书,几乎每天都写到凌晨二三点才睡觉。刚上小学放寒假跟我在一起的儿子徐武,每天晚上睡醒时总看见我坐在书桌旁的背影,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后来他在读初中写作文时,就写过一篇《父亲的背影》的作文,极富感情,获得语文老师的好评。语文老师还特地向我推荐了这一篇作文,我读后,心中暖洋洋的,能得到儿子的理解和认同,我感到无比地欣慰!这样挤时间,抢时间,经过两个多月的挑灯夜战,1980年春节前,五万余字的《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研究》杀青,当时虽是深夜,正是天寒地冻,大雪纷飞之时,但我为在汉民族研究的北大荒里开垦出了一块土地而感到暖烘烘的,正如一首名为《抽枝》的小诗所言:

终于
稳稳站在芬芳的土地
太多未来等待开始
将有艰难必须面对
成长是一种使命

四、扎 根

从萌芽到抽枝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而从抽枝到扎根是一个更艰难的过程。

《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研究》的初稿杀青后,1980年春节我乘回武汉探望年迈的父亲之时,把书稿给母校的老师刘孝瑜教授审阅。没想到刘教授给书稿以高度的评价,认为我的稿子一方面创造性地运用恩格斯“从部落发展到民族”的理论观点,另一方面又发展了范文澜先生关于汉民族是一个特殊民族的观点,第三方面提出了汉民

族形成是夏商周三代的新观点,是民族研究中的填补空白之作,建议我交出版社审定出版。

为此我向早在我读大学期间曾鼓励我和彭英明研究民族形成问题的牙含章先生求教,牙先生建议我把书稿寄给四川民族出版社的编辑李峰铭先生审阅,于是开始有了把《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研究》这支小枝培育成《汉民族发展史》这棵大树的过程。

1980年夏,我将《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研究》一稿寄给了四川民族出版社的李峰铭先生。不久,收到李先生的来信,明确告诉我选题很好,有学术价值,建议我补充一些内容,写成六七万字的书,并将书名改为《汉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这封信对于身处逆境中的我来说,无疑是一服兴奋剂。白天劳动虽然辛苦,尤其是果园里的梨子成熟时,晚上还要值班巡逻。由于蚊子又多又大,大热天还要穿上雨衣雨裤和高帮雨靴防蚊,但我仍然坚持边工作边修改,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按李先生的要求对书稿作了修改,并补充了汉民族的特征一节,于是1981年春将《汉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寄给了李先生。

这一次书稿寄出后,出人意料,除收到李先生一封书稿已收到的来信以外,久久不闻音讯。从果园到县城有30多公里,我每周回家过星期日时,问我夫人的第一句话就是四川有信来吗?这样,在企盼中,我苦苦地等了一年半,那时我常常想,我的《汉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这支小小的嫩枝能成活吗?当时还没有能奢望它成为一棵大树。

1982年6月,我终于收到了李先生的来信和退回的稿件。当收到这个邮件时,我心中一沉,是不是退稿了?但打开一看,既喜且忧,喜的是并没有退稿,而是我的书稿经过审阅,并征求了牙含章先生的意见,出版社决定出版;忧的是李先生经过审阅,对书稿提出了70多个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写成了小纸条,夹在稿子的相关地方,要回答和解决这70多个问题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难题,又将是一个新的高峰,我能攀登上去吗?过去是没有时间的难,现在则是

缺乏资料的难,在当时来说,我所处的武义及其周边的图书馆凡能借来的书我都借来看了。怎么办?从哪里去找资料呢?想来想去,只有去上海图书馆。但每月只有35元生活费的我,当时虽然因胡耀邦总书记签发了落实有关政策的文件,我正从果园回到家中等待分配工作,但要到上海去又谈何容易?这时我的患难伴侣,我的夫人徐桂兰想出了一个办法,她说:你们家不是有亲戚在上海吗?你坐我们仓库来运蛋的上海车去,不是可以不用花钱了吗!当时徐桂兰在武义县食品公司蛋库工作,每年蛋季都有上海食品公司的汽车来运蛋。于是我决定坐运鸡蛋的汽车,到上海图书馆去看书。

从武义到上海,有800多公里路,头天下午从武义出发,在义乌县过夜,第二天下午5时左右到达上海。坐蛋车当然没法与现在流行的豪华空调大巴车比,但当时我为能不花钱到上海去看书查资料心中美滋滋的,高兴极了!上海的亲戚叫黄北康,是父亲的表弟。当时他们住在老西门。他们家虽然十分狭窄,人口又多,但还是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安排我住在他们家中,晚上打地铺,住宿条件当然也没法与现在老百姓普遍住的新装修的房子相比,但在上海有一个安身之地,且又不花钱,早、晚还管饭,那是我父亲的面子,也是黄北康表叔对我的关心。

就这样,我每天早上在北康叔家中吃泡饭,然后走路到地处南京西路的上海图书馆去看书,中午在馆里买两个面包当午饭,晚上再回到北康叔家中就餐。但是我第一天进上海图书馆时却碰到了进门难的问题,因为我既无介绍信,又无工作证,却想看当时一般人看不到的30年代出版的书,尤其是港台出版的书,怎么办?连门都进不了,还谈什么看书查资料?难道这一趟要白跑了吗?还好,上海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还是很理解一个做学问的人的心理的。一个值班的工作人员问我带有什么证明材料,我想到我仅带了四川民族出版社李峰铭的来信,这位工作人员就叫我找馆领导去解决问题。经他的指点,我找到了馆长办公室,一位主管的副馆长,听了我的叙说,看了李峰铭的来信,就在信上作了批示,同意进馆查阅,由于签

名十分潦草,我当时又不敢问,虽然至今我都不知道他姓啥名啥,但我永远都不能忘却那刹那。正是从那时起,我这个被提起来了的心才落实下来,开始了继续培育《汉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这棵大树的关键的一段历程。

就这样,我早出晚归,如饥似渴地看了一本又一本。有重要的材料没有钱复印就抄书,做卡片。买不起卡片,我就从文具店买来一般 16 开的白纸裁成 64 开做卡片。近一个月的时间,我大约查阅了 100 多本专著,做了 3 000 多张卡片。不仅李先生提出的 70 多个问题我基本上可以回答了,而且由于看了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一部分中国民族史、中华民族史之类的书,我对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尤其是汉民族的特征,有了新的认识。

吃饱了养分后,我回到武义家中,开始对书稿进行全面的修改。

在此,我不得不提及季树才先生。当时他任武义县委宣传部负责人,主管教育口,具体管我的工作分配问题。在分配前,他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向他说了我正在按出版社的要求修改《汉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希望他能给我点时间。此人果然爽快,同意我在家修改书稿,什么时候改好,什么时候告诉他,什么时候分配我去工作。这样,我得到了难得的时间,事隔将近 20 年了,我至今还是要感谢他!

这次修改,一方面有了较充足的时间,另一方面又吸收了充足的养分,所以我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修改工作,将 7 万字的《汉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扩大成了 20 万字的《汉族史》。当我用方格稿子将草稿抄正之时,看着厚厚的约有 700 页的书稿,我心中油然生出一股悲壮之情,逆境中的崛起真是既悲且壮啊!正如一首名为《扎根》的小诗所言:

茁壮并深根
我们平和地迎接
雨的狂
风的劲

五、见 树

深深扎根于土地上的小树是不怕风雨的,具有生命力的。20余万字的《汉民族史》又经历了一个从小树长成大树的路程。

1983年初我的《汉民族史》交稿后,我个人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我为了能实现在大学求学师从岑家梧教授时曾立下终身从事民族研究的理想,从1983年到1984年底不断地向在报上刊发了招聘启事的单位联系调动之事。

1984年底,我接到我的师兄张有隼的来信,他说从中南民族学院方面得知我仍在中学教书,见我这几年发表了几篇论文,知道我一直坚持民族研究工作,说他现在已任所长,问我是否愿意去广西民族学院工作。接信后,我与桂兰商量,广西虽然僻远,但搞民族研究的资源丰富,1964年到1965年我参加三江“四清”工作,到过柳州、桂林,对广西的山清水秀有良好的印象。南宁虽然没有去过,但作为广西的首府不会比桂林、柳州差,加上广西民族学院内有一个相思湖,学院的自然环境也一定很好。这样,从来没有到过广西的桂兰,在家人的一片反对声中,坚决地同意与我一起去广西民族学院。

决心已定,我和桂兰都同时向单位递交了请调报告,花了三天时间打点了全部行李,用火车托运了行李,于3月25日一家三口乘火车离开了工作了20年的武义,奔赴陌生的南宁!

一到广西民族学院,没有多久,不仅《光明日报》发表了我写的《汉民族研究刍议》,也收到了四川民族出版社李峰铭先生的来信(这时李先生已担任四川民族出版社的副社长),要我到成都面谈书稿出版的有关事宜。于是,经学院黄鸣院长的批准,1985年,我利用到北京参加全国民族理论工作会议的机会,乘飞机绕道到成都,见到了李峰铭,并陪同李先生一起到重庆,住在重庆海军招

待所里,两人长谈了两夜。李对书稿的意见是:现在20万字的书稿比第二稿有了较大的提高,但社里对这本书寄予很高的希望,希望我能利用在广西民族学院工作的有利条件,进一步扩大资料面,吸收近几年相关的学术成果,写出一流水平的《汉民族史》,在相当的一个时期内能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我对李先生提出的要求感到惶恐,我对李先生说:我写第三稿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依我的水平,要写出全国一流的学术专著,恐怕很难胜任。李先生却不以为然,举了学术界许多实例,说明了学问是人做出来的,学术界许多大学者都是从小做起的,关键是你研究的方向准不准,是不是学术真正的前沿,如果认准了,坚持下去,一定会成功。三稿比二稿更好,难道你不相信四稿会比三稿更上一层楼吗?

在李先生的鼓励下,我回到了南宁,开始了向汉民族研究学术高峰的第四次的冲击。确实,正如李先生所言,扩大了资料面,学术思路会豁然开朗,我从1985年9月开始,钻进广西民族学院图书馆翻箱倒柜,不仅找到了许多我过去没有见过的书,还有我过去很少涉及的学术期刊。广西民族学院图书馆作为一个大学的图书馆,馆藏期刊比较丰富,从学术期刊上我逐渐掌握了学术发展的动态,摸清了学术发展的前沿。与此同时,结合我撰写的《民族理论政策简明教程》,我归纳和概括了汉民族史研究的规律,即应按民族发展的规律来研究汉民族。理论的升华,使我大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从1980年到1985年,整整六年的呕心沥血,使我悟到了汉民族发展的规律,决定从起源、形成、发展、特征和文化五个方面全面论述汉民族的历史过程及其人文特征。

理论清,方向明,经过近一年的努力,1986年一部50万余字的《汉民族发展史》脱颖而出,6万余字的《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研究》,历经六年,四易其稿,终于从一支小枝长成为一棵大树,正如一首名为《见树》的小诗所言:

阳光
雨露之必要
暴烈狂风之必要
一切将成为过程
我将展现根植土地的美丽
迎接根植土地的人群

六、成林（上）

《汉民族发展史》的撰写和出版使我的学术眼界更开阔了。从1986年定稿到1992年出版,《汉民族发展史》虽然经历了艰难而坎坷的历程,但我却没有为此而松懈。我明白“知无涯,学也无涯”,《汉民族发展史》完成后,我所钟情的汉民族研究应该如何再深入一步,再提高一步,再发展一步呢?我一直在探索,在思考。思考的结果之一,是准备进入汉族风俗史研究的领域。此事暂不详表,待后再叙,在这里我先说的是关于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汉民族的问题。

1993年3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谢剑先生的安排下,我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陈方正博士的邀请,到该所作为期一周的学术访问,其间由人类学系主持,作了《汉民族研究与中国文化》的学术演讲。在学术交流中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资深教授乔健先生和谢剑先生不仅出席了讲演会,还与我就汉民族研究的对象、内涵和方法论问题展开了讨论。他们建议我要学会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汉民族。

乔、谢两位先生的建议对于一直在民族理论方法论上摸索的我,无疑有指路的作用。过去我虽然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到贺县南乡作田野调查,撰写了《南乡春色——一个壮族乡社会文化的变迁》,初步运用人类学社会变迁的理论和田野调查的方法

进行课题研究,但那是以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的一种尝试,从根本上说来,那时的我对人类学的认识仅仅初步“亲密接触”,使我对传统的、受苏联影响极深的民族理论有了一种全新认识,深感其刻板、僵化和严重脱离生活实际,而初步感性地认识到了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生动、鲜活和紧贴生活实际。初次尝试就有豁然开朗、别有洞天之感。这次在乔、谢这两位教授的启示下,我的学术兴趣进一步地向人类学转移。

如何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汉民族?我的认识有一个从浅到深、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这一个过程,也正是我呕心沥血地开拓汉民族研究从见树到成林的过程。

起初,由于我的人类学知识浅薄,认为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就是要对当代的汉民族进行研究,就是要对汉民族的文化进行研究。过去,我费了六年的心血呕成《汉民族发展史》,从历史的角度切入,按照民族发展规律,从高处、远处对汉民族进行了鸟瞰,充其量只是给汉族画了一幅速写。现在就应该从近处对当代汉民族进行中观和微观的研究,因此必须对当代汉民族发展的历史和文化进行全方位的审视,所以,1994年我起草了一个“汉族历史文化研究”计划,打算立足当代,按省、自治区、市的行政区域来研究汉族的历史和文化,编辑出版一套“汉民族历史与文化丛书”。这个计划虽然有一定的创意,但由于过于庞大,不仅许多出版社无法接受,就是一些学者也觉得无从下手。后来,这个研究计划,通过上海文艺出版社徐华龙先生的推荐,被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胡小静先生看中,他认为计划虽然庞大,但创意新,有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为此,他建议我们调整计划,缩小规模,先按大区对汉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加以研究,这样既保留了创新,又便于操作。这个建议,当然是金玉良策,我们哪有不同意的道理,于是双方于1996年6月签署了约稿协议。从1996年6月开始,我进入了种第二棵树的历程。

第二棵树的种植过程,实际上是我不断学习人类学,不断运用人类学的过程。话要从1995年7月参加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社会